

# 移動的宋遼邊疆—— 英國伯明罕大學史懷梅教授學術訪談\*

The Moving Frontier between the Song and Liao: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aomi Standen

董永強 (Dong Yongqiang)\*\*

## 一、前言

史懷梅 (Naomi Standen)，1994年英國杜倫大學 (University of Durham) 東亞研究系博士畢業，學位論文題目為《從中原北部到遼的越境舉動：約900-1005》 (*Frontier Crossing from North China to Liao, c. 900-1005*)，此後，歷任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 (St. John's College, Oxford) 中國史初級研究員 (1993-1997)、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蘇必略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Superior) 歷史系亞洲史副教授 (1998-2000)、澳洲新堡大學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歷史學院中國史講師 (2000-2007)、英國新堡大學 (Newcastle University) 歷史學院中國史高級講師 (2007-2011)，現為英國伯明罕大學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藝術與法律學院 (College

of Arts and Law) 歷史與文化系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 中古史教授 (2011-)。目前，她致力於歐亞北部邊疆問題的研究，主要關注中古時期東北亞越境者、邊界、邊疆之間的互動關係。執筆《劍橋中國史五代宋史》「五代」部分，2007年出版專著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sup>1</sup> 2015年被譯成中文版《忠貞不貳？——遼代的越境之舉》，發表論文〈五代時期的劫掠與邊疆社會〉、〈遊牧者的需求：劫掠、入侵與947年遼的征服行動〉等數十篇，在學界影響巨大。

2016年2月3日，在伯明罕大學歷史與文化系史懷梅教授辦公室，筆者就宋遼邊疆地區的越境現象、身分認同、族群概念、英國的漢學與史學以及她個人對中外史學家治學方法的看法等問題對她進行了學術專訪，現將訪談內容整理如下並附其論著目錄於後，以饗讀者。

\* 本文內容經史懷梅教授審閱，謹致謝忱。採訪設計、審議和定稿過程中，得到同期訪問伯明罕大學的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辛枝副教授的幫助，一併感謝。本成果得到中國大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唐代西州基層社會與民族治理研究」和國家留學基金2014年青年骨幹教師出國研修項目資助。

\*\* 作者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訪問學者。

1 此書2007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學界有很大反響。相關評介可參見 Richard L. Davis, "Book Review: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7(2007): 527-528; Paul Jakob Smith, "Review: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8.1(2008): 242-250; 張帆，〈書評：Naomi Standen,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漢學研究通訊》27.3 (2008.8): 57-58; 李怡文，〈書評：Naomi Standen,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歷史人類學學刊》8.2 (2010.10): 152-155; 吳國聖，〈不羈之忠——評介 Naomi Standen,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新史學》22.3 (2011.9): 209-244。

## 二、訪談內容

董永強（以下簡稱董）：首先，祝賀您的著作漢譯本出版。<sup>2</sup>這本書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它主要是以漢人為主的遼南人（Liao Southerner）和跨界者為研究對象，探討政治、軍事變化對邊界地區官員和將領忠誠意識、族群認同的影響。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我想知道，您是如何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找到值得研究的問題的？

史懷梅（以下簡稱史）：開始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我對宋遼關係十分感興趣。我不斷發現許多文獻中記載著類似的人群，正如我之前研究早期歐洲中世紀史時關注的人群一樣，他們做著同樣的事情。攻讀大學時，我研究的是西法蘭克王國（West Francia，即今法國）和安達盧西亞（Al-Andaluz，即今西班牙北部）的關係。<sup>3</sup>我注意到一些在那個區域時常改變立場的家族，特別是巴努·奎西（Banu Qasi）家族。他們以學識淵博聞名於該地區，我讀本科時研究過這個家族。有趣的是巴努·奎西是穆斯林，西法蘭克是基督教徒，但很顯然，宗教、族群聯繫和語言與他們改變立場沒有關係。因此，他們有時樂意效忠基督徒王國——法蘭西國王，有時他們樂意效忠穆斯林王國——安達盧斯國王。他們並不在乎改變立場。我注意到宋遼的情況也是如此。在漢族官員中，有人事宋，但並非宋人。當我觀察五代時，這變得很清楚了。那些起初效忠於梁唐晉漢周之一的人們，此後效忠於遼。他們也不在乎改變立場。歐洲與中國情況相同，非常相似。所以，我對這些生活在邊境地區、邊境地帶和邊疆地帶的邊疆人群非常感興趣。

我開始尋找能研究的人群，那些跨界者，那些盡可能多地可以從兩邊都能研究的人群，因此想獲得同一人的歷史信息，它們既有來自五代或宋朝這邊的，也有來自遼這邊的。當然，這很難，因為這段時期的文獻互相承襲，史源錯綜複雜。<sup>4</sup>但是我發揮自身優勢，試著利用文獻之間的關係，設計了一種文本比較方法，試圖看到10世紀發生的事情。很難看出。但我試圖解開歷史的後來版本，看看剩下什麼，看看10世紀可能會告訴我們什麼。但是做起來並不容易，很明顯，在做這件事上有困難，甚至還有問題。

董：在10世紀歐洲和中國北部的現象之間，您發現了什麼？

史：它們看起來是相似的，雖然並不完全相似，但足以引發思考。

董：是什麼原因促成了您的研究主要關注中國中古史？

史：我的學士學位是研究中世紀早期歐洲歷史。在攻讀本科學位第一年，一個朋友借給我一本節選的英文版《莊子》，即伯頓·沃森（Burton Watson<sup>5</sup>）翻譯的《莊子》。讀過此書，我發現它和我以前讀過的任何東西都不一樣。我喜歡與眾不同的東西，覺得差異真的很有趣。因此我想更多地瞭解中國的文化和歷史，想知道為什麼那裡的人們可以產生我以前從未遇到過的這些驚人的想法。所以，我設法將研究範圍稍微向東方推進了一點，並決定攻讀中國中古史（Chinese Medieval History）的博士學位。

關於中世紀歐洲歷史我完成了我的第一個學位，然後去了臺灣學習漢語。所以我可以攻讀中國歷史的博士

2 （英）史懷梅著，曹流譯，《忠貞不貳？——遼代的越境之舉》（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3 1984-1987年，史懷梅就讀於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University of London, Queen Mary College），並以論文〈禿頭查理與安達盧斯：邊疆政治與外交關係〉（Charles the Bald and Al-Andalus: Frontier Politics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獲得歷史學一等學士學位。安達盧西亞（Al-Andaluz）為西班牙穆斯林統治區。

4 為破解這些難題，史懷梅首先探討了「史書編纂中的邊界（historiographical boundary）」問題，並根據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的討論，釐清了《遼史》的史源問題，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文獻相互比勘。詳見史懷梅著，曹流譯，《忠貞不貳？——遼代的越境之舉》，第一章「史書編纂中的邊界與10世紀的文獻」，頁47-53。

5 （美）伯頓·沃森（Burton Watson, 1925-2017），中文名為華茲生，是美國著名的翻譯家，主要致力於中日文學的翻譯與研究，對中國哲學和史學著作也有涉及。他翻譯的《莊子》被收入大中華文庫出版，同時也入選《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諾頓世界名著選集》，1997），成為中國典籍在美國譯介的經典之作。

學位。中國歷史是不同的，正因為它的獨特性，引起了我的想像。

董：《莊子》的想像神奇、玄妙、超絕，而且充滿了智慧。因此，很難讀懂。就斷代史而言，您認為您的英國同行和中國歷史學家的研究有哪些比較重要的差別？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您認為會是什麼？

史：很少有英國學者研究中華帝國史（Imperial Chinese History），做這方面研究的學者是少數，也許5到10位，他們大多關注宋、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史，主要是地方史、區域史，特別是東南部地區，因為存在大量的我們才剛剛開始調查的初級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由文人士大夫們製作的。而且我認為這些學者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年輕人越來越多地使用歷史方法。因此，在英國，為那些研究中國的人提供的傳統培訓就是做研究、學漢學、學中文。從事漢學的技能非常重要，但它們不同於歷史技能。我認為越來越多在英國從事研究的學者開始使用更多的歷史方法來研究帝國歷史。而不僅僅是漢學技能。這給了你一個非常不同的視角，因為當今的歷史研究要求人們對某些理論、歷史理論和其他類型的理論有一些瞭解，並採取一整套不同的方法來做，而不僅僅是關於文本解讀。現在有很多人在英國和美國學習中國歷史，越來越多的人想和其他大學歷史系的歷史學家交流中國歷史。英國的歷史系過去主要研究英國和歐洲的歷史，確實不涉及其他。但現在大多數歷史系都有一位中國歷史學家，有時更多。他們幾乎都是現代主義者，不關注中華帝國，而是晚清進入現代時期。因此，尤其要告訴這些人和他們的同事，中國歷史是多麼重要，而且歷史系確實需要研究中國歷史。不只是在中國研究系，中國歷史正逐漸成為歷史研究的主流。這對於中華帝國史來說並不真實。因為它是前現代的，在一些地方它仍然是在中國學系（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但確實有一些人，像我一樣在歷史系。他們也想告訴那些研究英國、歐洲、美國、非洲等等歷史的同事，中國史也是重要的，他們需要在歷史系中有人研究中國歷史。

董：這種情況在中國的大學裡同樣存在，歷史系的學者更多關注的是中國歷史，而不是俄國歷史或者美國歷史。

史：我讀大學時，英國大學歷史系的研究只關注英國和歐洲，也有點美國。但自從我工作後，研究範圍有所擴展。現在大多數院系都在努力變得更加全球化，儘量涵蓋更多世界其他各地，但這個過程相當緩慢。

董：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很多學者已經開始反思傳統史學中漢化模式和漢族中心觀的局限性，逐步糾正對征服王朝和異族文化的偏見，並用新的視角來客觀討論突厥、契丹、蒙古等族群的歷史和文化地位。作為一名一直關注歐亞草原民族和族群文化的專家，您認為以往的中西方關於邊疆族群的研究有什麼理論缺陷？西方的民族認同理論在多大程度上適宜於中國相關問題的研究？

史：這真是個好問題。我認為我們在研究中國及其他地方的邊疆問題時，主要是種族的起點問題。如果你從種族觀念出發，你就必須探討族性（ethnicity）。<sup>6</sup>因此，有一種假設，即民族認同必須始終是前現代時期人們的主要身分。可能現代人的民族認同是他們的主要身分。但這並不意味著前現代人也同樣。如果我們認為種族是他們最重要的東西，我們就不能問種族對他們來說是否是最重要的這個問題。我認為問這個問題很重要，也許答案是種族對他們來說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們假設答案，如果我們說我們已經知道答案是什麼，我們就無法思考其他各種各樣的可能。例如，我們不能思考其他類型的身分對他們來說是否更重要。也許他們的社會身分更重要。也許他們是學者官員，或者是農民，或者是工匠，也許這些身分更重要。或許他們的政治身分更重要。也許他們的主人，他們的統治者，是這個人而不是那個人，對他們來說更重要。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我們必須能夠詢問他們。因為我們不能妄想知道答案是什麼。因此，我認為中國研究的第二個問題是，種族被認為是最重要的，一切都被歸類為漢人或非漢人。這意味

6 史懷梅認為，不管前現代是否存在族性觀念，人們都一致認為族性觀念在前代至少部分上已經有所規範，並且假定它決定人們行為時起了重要作用，決定了包括從文化標準到政治效忠領域內人民的行為。

著除了我剛才描述的問題之外，它還假定你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誰或者什麼是漢人，誰或者什麼是非漢人群。而且這兩者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另一個問題是所有的非漢人群屬於一類，所有的漢人屬於另一類。所有的非漢人群被混在一起，但它們彼此不同。漢人一直都是漢人，非常特別。如果認為中國性重要，而非中國性不重要；如果將人群分為漢人和非漢人兩大範疇（categories），那麼就必須思考如何定義他們？漢人是因為他們是漢人後裔，還是因為他們的行為，或者因為他們所採用的文化而是漢人？譬如，如果你用中文名字，並聲稱要像一個漢人一樣行事，你會變成漢人嗎？問題是，這兩者都被使用了。有些學者會用其一。當祖先們的定義適用於他們想要表達的東西時，他們就會使用該定義；或者當使用中文方式的定義適用於他們所想要表達的東西時，他們就會使用中文名稱的定義。因此，根據你所說的，可以使用這兩個詞，也可以使用任何一個定義。所以，如果你想聲稱 10 世紀的中國邊疆人群不為非中國統治者工作，那就沒有中國人會為一個非中國統治者效忠。如果你想宣稱這一點，那麼你就定義了邊疆人，你強調邊疆是一個混合民族的地區，因此邊疆的人不是中國人。所以沒有中國人會為非中國人效命，因為那些人不是中國人，這是非常方便的，如果這就是你想說的話。如果你想宣稱非中國統治者變得中國化，那麼你強調的是他們用漢名，用漢人政府結構等等，突然他們成為中國人。當然，唐朝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們起源於混合種族，這是非常清楚的。但歷史學家真正喜歡說：「但他們是中國人」，所以這是非常矛盾的。人們對此非常擔心。我想人們很擔心：「這些人是中國人，哪些人又不是中國人？」而不是說：「我們不用擔心」。讓我們看看他們做了什麼。讓我們試著去研究到底是什麼真正激勵了他們。也許是他們的民族身分，也許不是。我們需要考慮的是不堅持的動機一定是他們的種族認同。

董：當我們讀唐代的一些歷史文本時，我們可以看到，在唐代，一些非中國人在西部地區可以改變他們的身分。您認為西方的身分理論是否適用於這種情況下人們可以改變身分的分析？

史：是的，我認為當我們看到你剛才描述的案例時，必須非常小心。我們怎麼知道你所探討的人想被認為是漢人？也許他們是這樣。但是，我們需要謹慎使用我們的範疇。西方有許多不同的相關理論，但也許最有用的是人們有多重身分。所以他們可能有國家認同身分、地區性的身分、階級身分、職業身分、性別身分等等許多不同的身分。他們可能在任何情況下使用一個或多個身分。因此，他們將根據他們所處的環境選擇某些身分。譬如說，我是英國人，英格蘭人，來自倫敦。所以我要說的是我和誰說話，如果我跟美國人說話，我可能會說我是英國人。如果我和蘇格蘭人談蘇格蘭獨立，我可能會說我是英格蘭人。如果有人問我從英國哪裡來的話，我可能會說我是倫敦人。所以我使用的每個身分都取決於我所處的環境。我也可以使用我的階級身分，或者我的性別身分，這取決於情況和與形勢相關的東西。因此，當你在思考情況時，多身分的概念，每個人都有許多身分，他們選擇不同的情況可能是最直接有用的。例如，可能是你唐人，屬於非漢人群，取漢名，學寫漢字。但他們也可以繼續沿用自己的、原始的、儀式的習俗。他們可能有他們喜歡吃的食物，所以這取決於他們處於什麼樣的境地，他們在做什麼。如果他們和一個中國皇帝交談，他們可能想要強調他們能讀和寫中文。如果他們在和親戚談話，他們可能會說讓我們開個派對，來吃傳統食物。

董：近代民族國家成立之前的遼人、宋人、金人等這些族群跟民族有什麼不同，我們在做歷史時期的邊疆民族研究的時候，nation, ethnic, people 這些概念到底該怎樣使用，您認為哪個更加合理？

史：另一個重要的理論是身分被建構的想法。它們通常是出於政治原因被製造出來的。沒有什麼是固定的。所以不能認定生於河南的人就是中國人。出生地這個要素很重要，但它不一定會對那個人的一生都重要。所以我想，遼和金繼續唐的實踐，更多重視的是人們所能做出的貢獻，而不是他們的種族或文化背景。例如，唐朝重用高句麗人為將領，遼則用宋人為將領等等。在這一點上宋似乎是不同的，可能也是 1005 年澶淵之盟以後，北宋時期的文人菁英愈加強調夷夏之別，越來越多地強調宋人和遼人的不同。因為他們是敵人，宋想要把

遼「他者化」(othering)。<sup>7</sup>也許遼也做了同樣的事情。但要做到，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我認為這是些需要思考的重要想法，因為我一直在說這些事情應該是問題而不是答案。我們不應該假設答案。如果我們考慮少數派，而使用「少數民族」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假定有多數。如果你談論少數民族，那麼你就假定漢人占多數，所以漢人總是處於中心地位，不能平等方式看待其他族群，無論他們是誰。如果你使用「族群」這個詞，你可以將他們視為獨立於漢人的族群來考慮。不必總是和漢人有關，可以考慮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你可以考慮突厥人與藏族人的關係，如果與漢人無涉的話，根本不需要有漢人存在，所以我認為避免使用「少數民族」是非常有用的，因為如果用這個詞，就永遠逃不出胡漢兩分的分析模式。它假定大多數人口是中國人。當然，唐代人口極其混雜，會忽略使用「少數民族」，因為它假設有「漢人」，而「漢人」其實是種族混合而成的。

董：讀您的書讓我重新思考如何在我的研究中運用民族觀念，因為在唐代，我們沒有這個概念。用現代概念來分析前現代情況是否合理？

史：這非常困難。如你所言，「民族」是現代概念，很多研究試圖在一個沒有真正用過它的歷史時期探討它。你的課題名稱是「唐代西州基層社會與民族治理研究」，所以，如果你只是從基層社會的視角去思考治理問題，那麼你就忽略了族群問題，並沒有嘗試和談論族群問題，是只關注治理和基層，而不擔心族群是什麼。族群對你的研究有貢獻嗎？他們有什麼貢獻？這些是你思考的核心問題。我傾向於用遼來指政治單位，它當然是多民族的，有漢人、契丹人、突厥人、沙陀人、回鶻人，是多族群混合統一體。所以，我將政治單位與文化團體等其他團體嚴格區分開來。更傾向於探討文化單位，而不是族群，因為你可以談論文化。

董：在正史上，突厥只是一個名詞而已。因此，我

們不知道它的真正含義。我們從古代歷史記載中僅僅知道突厥與中原不同。我們對他們的感情和他們的文化瞭解甚少，關於他們的信息和材料非常有限。然而吐魯番文書中記載，突厥游奕部落派人修護堤堰，引水灌溉農田。<sup>8</sup>我怎麼能用原始材料和新的視角來研究這麼少的信息呢？

史：吐魯番的突厥人修堤堰，澆農田，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種方法是說：讓我們把研究人群的所作所為放在首位，而將族群標籤放在第二位。也許我們可以構建一個場景：這裡有一群人被稱作突厥人，他們修渠灌溉，他們養馬，他們貿易，或者做其他事。雖然你能得到一個被稱為突厥人做的所有事情的清單。但你無法假設你知道他們將要做什麼。你得從歷史文獻所記載的人們開始探討，得從那裡開始建構。因此，我們經常犯的毛病是，有突厥人這個範疇，並且認為文獻告訴我們的某些事是所有突厥人都會做的。但是，他們當然並不都那麼做。你可以將它作為因素之一，與出土文獻記載的人們實際正在做的事情進行比較。它們是否匹配？或者它們在哪裡匹配，哪裡不匹配？也許他們並不是都在做同樣的事情。人們正在做的事情上有什麼樣的變化？他們做同樣的事情還是做不同的事情？而不是假設任何一個突厥人都會和其他突厥人一樣做同樣的事。因為我們不認為漢族人都做同樣的事情。漢人中有些人是文人士大夫，有些是農民，有些是工匠，有些則是士兵。那麼，我們為什麼會假設每個突厥人都做同樣的事情呢？我想說的是，族群研究首先應該從文本中的實際內容開始，然後擱置但非忽視其標籤，而是將其放在一邊，放在第二位，專注於文本告訴我們的研究群體的行為：他們在做什麼。

董：這答案很棒，但文本有時互有出入。

史：這是歷史文本的問題。編撰歷史很困難，史家們不得不從某種視角出發修史，形成歷史記載的文本。

7 「他者」是在現象學中與同者相對的概念。他者的形成必須發生在二元對立的關係之中，而且對立的雙方存在著某種不平等或壓迫關係。同者利用武力、語言、意識形態對他者行使霸權，對其進行排擠、支配和控制。他者被邊緣化、屬下化，失去話語權的過程稱為「他者化」。

8 兩事見吐魯番阿斯塔那 509 號墓所出〈唐開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高昌縣申西州都督府牒為差人夫修堤堰事〉和〈唐開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都督府致游奕首領骨邏拂斯關文為計會定人行水澆溉事〉，文書內容見唐長孺《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錄本第 4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 315-317。

但是如果我們試圖瞭解那些被書寫者的所作所為與所思所想，我們唯一能依賴的就是史家們的記述，但這是有問題的。我們不能依賴於史籍記載告訴我們被書寫者的言論，因為很多時候史家編寫歷史以彌補歷史人物的言論，是編撰者創造了這些話。所以這是不可靠的，但我們可以更自信地描述某個歷史人物，比如，他給某人寫了一封信。他殺了某人。他又投靠某人。他參加了修渠勞動。在小心求證同時，對他所做的事，我們可以稍微有點自信。

董：在我看過您的書之後，我很欣賞您用來分析種族和身分的框架，我想把這個框架應用到我的研究中。然而，由於時間和材料的限制，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為我的課題制定一個新的框架。您是如何建構分析框架的？

史：這非常困難，它我花了很長時間。在讀博士時，我逐漸設計出研究所需的分析框架。但是，當我為本書重新修訂博士論文時，我把所有東西都顛倒過來。實際上，我要從另一個地方開始，因為在研究過程中，我改進了分析框架。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個提前創建的單一模式的分析框架。我的出發點是：我們能弄清楚我研究的歷史人物是怎麼看待忠誠的，他們又是如何從忠誠中獲益的。那是在閱讀一些傳記並將之與歐洲的案例比較後發現的一個問題。現在，我正在用一個新的框架來考慮它。忠誠源於對國家邊界的擔憂和不滿，以及對利用國家政治實體作為前現代歷史的主要基石的不滿，而我們仍然經常這樣做。很明顯，像佛教這樣的事物不注重國家邊界。那麼，當佛教與國家邊界無關的時候，你該如何處理佛教這樣的話題呢？你可以斬釘截鐵地說：「這是遼的佛教，這是高句麗的佛教，這是西藏的佛教。」但它們實際上都是密切相關的。所以這不是很有幫助。出於政治原因，研究者常常人為地把它們分成不同的單位。這就是為什麼政治如此重要？所以我正在嘗試思考研究這些問題的新方式。因此，我認為，要想形成新的框架，就必然要拋開舊的思維方式，並對其進行真正批評。追問自己：「它們不起作用。有什麼別的我可以用的嗎？」「即使它帶我去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它可能會做什麼。」努力嘗試形成分析框架。每個項目都需要自己的框架，而且需要自己的方法。我們所能做

的就是敞開胸懷，非常非常挑剔。我有這樣一個框架，讓我思考種族問題。對這些人沒什麼用。那麼，我能不能從不同的角度來考慮這些人呢？使用新的範疇讓它更有意義。所以我試圖深入到我所讀到的人的頭腦中，我正在研究誰。好吧，他們不是從種族角度來思考的。我能確定他們是怎麼想的嗎？他們在想什麼？所以在我的書中，這讓我想到，忠誠似乎是激勵他們來到這裡的原因。他們把忠誠放在哪裡似乎是驅使他們的原因。所以我在尋找是什麼驅使人們採取行動。那麼，是什麼讓人們以某種方式行事呢？我能看看裡面的圖景嗎？但實際上很多人都在使用同樣的東西（也就是忠誠）。所以願意重新審視分析所用的範疇，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這樣你就不會認為你已經知道這些範疇是什麼了。你說，「實際上，這類分析是行不通的。有什麼我能用得更好的嗎？」但這並不容易。

董：在邊疆民族地區，當您處理中央和地方政府時，很難只使用一個分析框架。

史：是的，所以，就你的研究來說，你要自問：種族是有用的嗎？它起作用了嗎？這是人們正在使用的東西嗎？得把它當作一個問題來問。不要想當然。同時，我也會想：政治在這裡是如何運作的？這些人自認為是唐代行政區的一部分嗎？或者他們認為自己是突厥的一部分？這與政府機構、行政單位，還是與忠誠有關？如果你在談論粟特人，尤其是它真的與經濟學有關嗎？它真的是關於與貿易網絡和人群關係相關嗎？可能根本不是。那真的是它們的意義嗎？是契約嗎？他們是否考慮與人簽訂契約？與死者簽訂合同？還有什麼可以談論或思考的？與階層有關嗎？人與人之間有明顯的區別嗎？我們是下層民眾，我們就必須做文人告訴我們的，或者我們必須按照官員告訴我們的去做。還是我們必須做我們的首領告訴我們的？所以我會盡可能考慮更多不同範疇。你能看到人們使用多少種不同的範疇，然後你可以開始說：哪個更行得通。在你的文本中，哪個範疇似乎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人們關心的事物中。不是在我們腦子裡，而是在文本裡。但是，我們必須從我們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後退一步，因為現實世界是由一切通向我們的事物所塑造的。我試著想像過去的人們有不同的方式來構建這個世界。他們採用不同的方式來構建的世界

對我們來說並不總是有意義的。例如，宗教可能是重要的。對於西方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構建世界的方式。我們在學生中經常使用這種方法。我們試圖讓學生們明白，在這個世界上，宗教對人們來說是一件生死攸關的事情。他們寧願死也不願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讓學生瞭解這一點是一項重大成就，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覺得很難理解，因為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世俗的國家。但這有助於他們認識到，也許還有其他範疇在過去是重要的，即使它們現在不重要。

董：現在學術界提倡跨學科研究，在您思考書寫全球中世紀史（Global Middle Ages）時，您有沒有借鑒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地理學或其他學科的最新理論和方法？如果有，您能舉個例子嗎？

史：我認為西方歷史學家是喜鵲。他們從任何地方獲取主意，只要它們行之有效。在做全球中世紀課題時，我們借用了大量不同的想法。比如：我在研究中越來越多地使用物質文化。不是來自物質文化上的文字，而是城市規劃和陶器，以及那種真正的考古學材料。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我發現從非洲考古學的研究中得出有關政治權力的理論是非常有趣的。因此，非洲考古學家提出了一些非常新穎的政治權力觀，我認為這非常有用。他們幫助我思考我所關注的歐亞大陸東部的政治權力。他們對政治權力的本質、權威和合法性有一些非常獨特的見解，可資借鑒。

董：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學者與中國學者研究方法的差異。以往中國學者在研究中更多採用傳統的方法，而不使用其他學科的方法，因為他們認為不同學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分界線。但現在也強調跨學科研究。

史：有很多西方歷史學家喜歡以一種非常傳統的方式進行研究。對很多學科來說，這是一種非常明智，而且優良的工作方式。但對於像全球中世紀這樣的新話題，我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研究。我們還在努力研究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這是一個領域，還有很多其他領域。但這個領域，在思考關於事物的思維方式方面，其他學科可以提供給我們的是有用的。

董：在中國未來的中古史研究領域，您最希望看到什麼樣的成果呢？

史：目前在絲綢之路上做了很多工作，我認為這是

非常有價值的工作，因為它是一個新的領域，我們知道得很少。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考古工作也正在進行中，特別是在北方。我會特別感興趣看到北方的考古進展。譬如安史之亂以後黃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區的考古成果。目前，在東南部的宋代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為這是所有材料的所在地。也是材料能所反映的地區。但事實上：北方發生了什麼？我希望看到更多的關於金、遼、蒙古的著作，因為中國學者對蒙古的研究不多。還有元代和元以後。人人都研究忽必烈，但沒有人研究元朝後期，所以很少有人研究元代中期和後期，所有學術語言中都是如此。

董：相比其他朝代，可資利用的資料的多寡是非常關鍵的。

史：但元代有很多書面材料。元代是真正的謎，因為元代確實有文字資料。這並不難，但人們不學習它。

董：您認為具備什麼樣的素質才能稱為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

史：我認為歷史學家首先必須具備的最重要的品質、技能和習慣就是懷疑主義。不相信所讀到的，批判並檢驗所面對的。這並不是說應該考慮它的真實性（authenticity）。我認為，真實性對歷史學家來說並不是一個有用的概念，但他們應該閱讀並懷疑：「這是真的嗎？這真的發生了嗎？」「寫這個的人是誰？他們為什麼要寫這個？他們想說什麼？他們想讓我明白什麼？」「如果我知道，那麼這能幫助我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嗎？」報紙報導試圖以同樣的方式告訴你，他們編故事，試圖告訴你一個特定的解釋，但你必須剝離解釋，並告訴自己說，事實上，他們的解釋背後有另一個故事，也許這才是我更感興趣的。其次需要耐心和韌性。即使看起來不可能，你也要堅持下去。最後還需要有想像力。你必須能夠試著把自己放在古人的立場上去思考。這樣想：我是一個現代人，但我正在嘗試想像生活在那個世界，一個歷史的世界，想像它是什麼樣的。

董：如今，許多研究歷史的大學畢業生在中國找不到工作。他們將不得不攻讀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因為他們相信如果他們能獲得更高的學位，他們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但在他們獲得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之後，他們仍然不一定可以找到好工作。所以有些人說學習歷史

是沒有用的。您認為，歷史對於普通人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

史：這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歷史本身：歷史如何對人們有用？另一個是歷史學位對人們有用嗎？我認為第一個問題很容易回答。歷史對人們來說很重要，因為它幫助他們瞭解我們的世界是從哪裡來的。它有助於給人們一些感覺：其他人對事物的想法、做事的方式是與我們不同的。人們必須面對這種差異。就歷史學位而言，30年前在英國，由於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不喜歡歷史，出現了一場大恐慌。她認為歷史是無用的。所以歷史學家們聚集在一起，列出了一份歷史研究帶給學生的技能清單，今天仍然在用。現在大學都有開放日（open day），為申請者攻讀歷史學位提供這方面的諮詢服務。這就是為什麼史學是好的：史學使你能夠處理大量的材料，瞭解它們，用大量不完備的材料來進行邏輯縝密的論證。史料總是不完整的。但你仍然必須能夠從史料中得出結論，並根據不完整的材料進行論證。史學幫助你做到這一點。這在很多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你從來不知道所有的信息。你必須能夠根據你所擁有的證據得出合理的結論。所以使用證據來構建一個特定論點的能力：這是史學賦予的一項非常重要的技能。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在這個國家，許多雇主看重歷史學家所具備的技能，因為他們希望人們對事物能夠批判和思考，能夠用證據建構一個清晰連貫的論點，而不用擔心他們信息不全。

董：常有人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sup>9</sup>對某些人來說，研究歷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真相。但對於一些人來說，他們不認為歷史有任何真實性。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史：我認為在英國、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歷史不是尋找真相。真相不止一個。歷史可能有很多真實的解釋，歷史研究的重點不在於發現一個單一的真相；而在於就歷史進行辯論、討論和對話。並且要理解，許多不同的闡釋方法可能都是有效的，因此一個歷史事件可能存在幾個不同的合理解釋。有效與否，取決於你是誰，以及你想用它做什麼，你選擇了哪種解釋。但它們都是

有效的。並不是每一種解釋都是正確的；有些人寫了糟糕的歷史，誤用了證據等等，但有可能有幾種不同的有效解釋，它們確實以一種完全合理和明智的方式使用證據，但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這些結論可能都是完全合理的。只是你可能會從一個角度說，「我贊成這個解釋」，我可能會說，「我支持那個解釋」。這沒什麼。因為你們可以互相討論，為什麼你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解釋，這讓我思考我的解釋，然後我會說一些能讓你們思考你們的解釋的東西，所以我們都學習了。因為歷史不是固定的。對歷史的研究總是在變化，而且總是流動的。它是活著的，一種活著的東西。我告訴我的學生，當我們意見不一致時，我們學到的最多。有禮貌地，有證據的討論歷史，證據是至關重要的。但是，解讀證據有許多不同的可能方式，也不是只有一種方式是正確的。因此，可以從人類學視角去解讀，得出一個答案。也可以用歷史地理學視角來解讀，可能會得出另一個答案。以此類推。然後你把這些答案放在一起，會認識到整個事物的每個不同部分。

## 附錄：史懷梅主要論著目錄

### （一）專著

- 2009 “The Five Dynastie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5,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Part 1, ed.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8-132.
- 2007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曹流譯，《忠貞不貳？——遼代的越境之舉》，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 （二）編著

- 2018a *The Global Middle Ages, Past and Present Annual Supplement* 13, ed.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Frontiers in Question: Eurasian Borderlands, 700-1700*, ed. D. J. Power and Naomi Standen (Macmillan).

9 有人認為此話出自胡適，實為謬傳。相關研究參見謝泳，〈胡適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新民週刊》51（2003）。



## (三) 論文

- 2018b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Introduction: Towards a Global Middle Ages," in *The Global Middle Ages, Past and Present* Vol. 238, suppl. 13, ed.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44.
- 2018c Conrad Leyser, Naomi Standen and Stephanie Wynne-Jones, "Settlement, Landscape and Narrative: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History," in *The Global Middle Ages, Past and Present* Vol. 238, suppl. 13, ed.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2-260.
- 2018d Naomi Standen and Monica White, "Structural Mobilities in the Global Middle Ages," in *The Global Middle Ages, Past and Present* Vol. 238, suppl. 13, ed.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8-189.
- 2018e "Followers and Followership in Northeastern Eurasia, ca. Seventh to Tenth Centuries," *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 Rome, China, Iran, and the Steppes ca 250-750 CE*, ed. Nicola di Cosmo and Michael Ma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00-418.
- 2017 "The Attraction of Opposites: Owen Lattimore and Studies of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Roman Frontier Studies 2009: Proceedings of the XXI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Limes Congress), ed. Nick Hodgson, Paul Bidwell and Judith Schachtmann (Archaeopress), pp. 357-364.
- 2013a Naomi Standen and Gwen Bennett, "Difficult Histories: Change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Liao in PRC Regional Museums over Three Decades," *Modern Asian Studies*, 48.6 (2014): 1519-1565.
- 2013b "Foreign Conquerors of China," *Demystifying China: new understandings of Chinese history*, ed. Naomi Stande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33-40.
- 2011a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The Framing of the Liao Dynasty (907-1125) in Chinese Sources," *Asia Major*, 3rd ser., 24.2 (2011): 147-198.
- 2011b "Who Wants to be an Emperor? Zhao Dejun, Youzhou and the Liao,"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ed. Peter Lorg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15-46.
- 2011c Gwen Bennett and Naomi Stande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Views of the Liao (10th to 12th Centuries) Borderlands in Northeast China," *Places in between: The Archaeology of Social,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Borders and Borderlands*, ed. David Mullin (Oxbow), pp. 80-98.
- 2007 Naomi Standen and Francis Jones, "Revealing Alternatives: Online Comparative Translations of Interlinked Chinese Historical Texts," *Creating and Digitizing Language Corpora: Vol. 2, Diachronic Databases*, ed. J.C. Beal, K.P. Corrigan and H. Moisl (Palgrave), pp. 172-195.
- 2005 "What Nomads Want: Raids, Invasions, and the Liao Conquest of 947,"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ed. Michal Biran and Reuven Amitai (Brill), pp. 129-174. (Japanese trans. Yamane Naoki 山根直生, 2018) .
- 2003 "Raiding and Frontier Society in the Five Dynastie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ed.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Wyatt (Curzon Routledge), pp. 160-191.
- 1999a "(Re)constructing the Frontiers of Tenth-century North China," *Frontiers in Question: Eurasian Borderlands, 700-1700*, ed. D. J. Power and Naomi Standen (Macmillan), pp. 55-79.
- 1999b "Introduction B. Nine Case Studies of Premodern Frontiers," *Frontiers in Question: Eurasian Borderlands, 700-1700*, ed. D. J. Power and Naomi Standen (Macmillan), pp. 13-31.
- 1997 "Alien Regimes and Mental States: Review Articl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0.1 (1997): 73-89.
- 1996 "From Region of Frontiers to Frontier Region: The Political Uses of Ethnic Identity in Tenth-century North China," *Selected Papers of the 10th Biannual Conferenc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ed. Lucie Borotová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p. 18.
- 1992 "Confucian 'Renegades' and Images of Loyalty for Tenth-century North China,"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1992), pp. 14-22.
- 1991 "Living Abroad: Han Chinese Servants of the Liao Dynasty (907-1125)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Medieval History*, 1.3 (1991): 128-133.